

君子观于铭

——两周铜器铭文的阅读方式与文体观念之变

李冠兰

内容提要 西周时期，对书史类铭文的观看是凝视式的审读。春秋以后，铭文铸刻更注重装饰性而非可读性，对铭文的观看亦趋向浏览而非细阅。书史类铭文衰落，“器主+祈句”类铭文占据压倒性优势，削弱了对铜器铭文的阅读需求。在祭祀仪式中，对彝器的观看是一种整体的沉浸式感受。而在对宗庙重器专门陈列和观览的情景中，对铭文的审读则呈现更明确的主动性。春秋战国以后，铭体的阅读主体从宗族扩展到范围更广的贵族阶层甚至万民，其文本突破了铜器的实物载体，从物质性、实用性的礼仪文体转变为文献性、观念性，甚至可以被构拟的书面文体。

关键词 铭体；阅读方式；礼仪空间；文体观念

铜器铭文文体诞生于商周礼乐文化的背景中，它不仅是铜器的物质组成部分，更是它所处的礼乐制度在观念上的延伸。因此，对铭文的文体形态、功能及观念的解读，应充分结合其物质形态及礼仪背景加以考察。其中，铜器铭文的阅读行为、阅读空间与接受方式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礼记·祭统》云：“是故君子之观于铭也，既美其所称，又美其所为。”^[1]即是较早的对“观铭”意义的发现与概括。但在此以前，铭文的观看与阅读行为早已存在，而文体观念亦已蕴藏其中。周人对铭文的阅读是面对铜器实物、在具体的礼乐背景下发生的，与阅读黑底白字的铜器拓本有着根本不同。铭文不仅是凝固在器物上的文字，它与铜器花纹、器形相互呼应，与观者的阅读发生往来互动的关系。巫鸿从美术史的角度指出对商周铜器的研究应引入“空间”的因素^[2]，这对铭文研究很有启发意义。探究两周铜器铭文的铸刻位置、排布方式的特点及演变，还原其使用的礼仪背景和礼仪空间，有助于理解铭文在何种情景下、以何种方式被阅读和观看^[3]。春秋战国以后，从时人对铭文的称引中，可以看到口头引用、简册传播和文体构拟等多种接受方式，铭

文的书写和阅读逐渐脱离其礼仪背景和实物载体，提示着铭体观念的转变。本文希望通过观察这些复杂而隐微的物质性特征和文献细节，把握两周铭文的接受方式与观念的转变。

一 铭文的铸刻方式与阅读习惯

铜器铸铭的现象首见于商代，郭宝钧指出此时的铭文是此器物使用的暗记，不应居显著地位^[4]。从晚商至东周，铜器铭文的铸刻位置呈现由内而外的变化趋势，学者对此已有前瞻性的关注和探讨^[5]。两周铜器铭文的铸刻位置与排布形式的变化与时代、器形、铭文功能等因素有着比较复杂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更反映了时人对铜器铭文的接受方式与阅读习惯，故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以下先就一些基本的现象进行描述和分析，再由此探讨周人对铜器铭文的阅读方式经历了何种变化，与铭文文体的演变又有何种关系。

第一，对两周代表性青铜器的铸刻位置进行调查和统计。选取鼎、壶作为研究对象，依据时代、铸刻位置与铭文内容，对《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6]《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7]所

收铜器加以分类统计。之所以选用这两种器形，是因为在各类青铜器中，其铭文的铸刻位置在两周的变化最为显著，而簋、盘铭文的铸刻形式未显示出明显的时代变化；钟铭的排布形式比较特殊，且已

有学者进行了细致的统计和研究^[8]，故未作统计。另外，10字以下的铭文基本只标识作器者及附带祈句语，阅读功能并不明显，因此仅统计铭文10字以上的铜器，且同铭器只计为1例。

表1 两周青铜鼎铭文铸刻位置统计表

(单位:例)

时代	器内、盖内铸铭	器表铸、刻铭				合计
		“器主+祈句”及其他传统铭文	占比	物勒工名	占比	
西周时期	338	0	0%	0	0%	338
春秋(无法分期)	7	0	0%	0	0%	7
春秋早期	107	8	7%	0	0%	115
春秋中期	10	0	0%	0	0%	10
春秋晚期	34	9	21%	0	0%	43
战国(无法分期)	0	0	0%	2	100%	2
战国早期	5	4	36%	2	18%	11
战国中期	1	6	40%	8	53%	15
战国晚期	1	4	10%	36	88%	41

表2 两周青铜壶铭文铸刻位置统计表

(单位:例)

时代	器内、盖内铸铭	器表铸、刻铭				合计
		“器主+祈句”及其他传统铭文	占比	物勒工名	占比	
西周早期	12	0	0%	0	0%	12
西周中晚期	61	6	9%	0	0%	67
春秋	32	22	41%	0	0%	54
战国	2	5	14%	30	81%	37

据表1和表2,从西周到春秋时期,青铜鼎、壶的铭文铸刻位置确实呈现自内而外的趋势。战国以后,物勒工名类铭文比例大增,虽刻于器表,但往往处于不显眼处,如鼎铭多刻于背面。这类铭文明显并非供专门的展示阅读之用,故在统计中予以区别。

第二,铜器铭文铸刻布局有多种表现形式:

(一)块状形式。行款作多行,一般自右而左竖读,个别自左而右竖读。在商代至西周,这类形式最为常见,普遍见于各类铜器的内底、内壁、盖内等。春秋以后,仍主要见于器内,同时开始出现于青铜壶、缶等铜器的外壁。

(二)线性形式。主要见于春秋以后,多呈单行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的形式,围绕于铜器盖面、

盖沿、器身、肩部、口沿等,与容器的形状、器表的弧度相互呼应,与器表纹饰相搭配融合,有明显装饰性。铭文较长者则可见多行旋读的形式,如鄢夫人媿鼎(《铭图》2425,春秋晚期)铭文分两行铸于肩部两圈,先外圈,再内圈顺旋而读。

(三)铭文满布器表或器表的某个平面。见于春秋以后,如庚壶(《殷周金文集成》^[9]9733,春秋晚期)、中山王饗鼎(《集成》2840,战国晚期)、中山王饗壶(《集成》9735,战国晚期)等。

第三,两周铭文铸刻位置的演变趋势所反映的阅读方式的变化,并不是简单的从不读到读,涉及比较复杂的因素,试就其中两个方面加以探讨。

(一)与铜器器形的变化直接相关,往往随器形演变而作出相应调整,以适应铸造工艺和铭文展

示的需要。西周壶铭多铸于颈内壁、盖上。春秋以后，传统器形的铜壶大部分保持铸铭于器内的惯例，如洹子孟姜壶（《集成》9729，春秋晚期）、陈喜壶（《集成》9700，战国早期）；而新式器的铭文则多铸刻于器表，如赵孟壶（《集成》9678、9679，春秋晚期）、令狐君嗣子壶（《集成》9719、9720，战国中期）、庚壶等。青铜鼎的铸铭位置亦与器形有直接关系。西周的方鼎以及主流的圆腹鼎，铸铭都在鼎内壁。据表1，在整个春秋时期，鼎铭仍主要铸于器内壁及盖内，而这些铜鼎正沿袭了西周的旧式器形。春秋以后，小口鼎以及子母口鼎逐渐盛行，开始出现铸铭于鼎外壁、盖外的现象。事实上，从观者的角度来看，传统的圆腹鼎内壁至内底呈大片向下内收的平面，这比鼎外壁更便于长篇铭文的展示与阅读。而春秋以后出现的小口鼎、子母口鼎的器身有略微向上倾斜的较大平面，且鼎盖的使用增多，在这些平面上铸刻铭文则更便于展示，观看角度更自然。可见铭文的铸刻位置是在器形和展示需要之间协调和平衡的结果。

（二）与铭文功能向装饰性质的转向相关。晚商至西周的铜器，器表纹饰在视觉上占据绝对优势，铭文则多铸于器内，并无装饰功能。西周晚期，线性形式的铭文出现于器表，显示出明显的装饰意图。如梁其壶（《集成》9716，西周晚期）在器颈和器颈花冠外分铸两行铭文，各自环绕壶身，内容相互接续。由于壶身铭文是横向的，若要通读全铭，阅读者需要侧着头绕壶两周。显然设计者并没有考虑阅读的便利，而仅仅关注如何将文字置入壶身的纹饰之间。又如睪壶盖（《集成》9677，西周晚期）铭文分铸于壶盖莲花瓣形的捉手上，阅读被不断打断。春秋以后，线性形式的铭文逐渐增多，其形式上的装饰性或多或少地损害了易读性，如鄢夫人嬭鼎，观者同样需侧头绕器两圈方可读完。曾仲奭鼎（《铭图》2254，春秋晚期）盖铭绕中心逆旋而读，行款不规则，还漏铸了3字，这些铭文会否被阅读是很可疑的。编钟铭文铸刻方式的演变也显示出相似规律。西周钟铭除了极个别例子（𠮟钟），皆铸于钟的正面。若铭文太长，则以两枚或四枚钟合为全铭，以正面连读的方式铸铭^[10]，这种形式无疑是便于阅读的。春秋以后，在钟的正、反面皆铸铭

成为其时代特色^[11]。如春秋晚期的王孙诰钟，应分两层从大到小排列悬挂^[12]，其中前十二枚钟各自铸一篇完整的铭文，后十四枚则组合而铸铭，铭文按正面钲部—正面左鼓—背面右鼓—背面钲部—背面左鼓—正面右鼓的顺序绕钟一周，再继续到下一钟，每二、三或四枚合为一篇完整的铭文^[13]。考虑编钟悬挂的状态，不断绕过钟架前后阅读同一枚钟的铭文是非常别扭的。前五枚钟钟体巨大，铭文只铸于正面，可知只有它们才是真正供人阅读的。对于铸铭空间有限的小钟，西周制作者采用在多个钟正面连续铸铭的方式，而王孙诰钟的制作者则围绕钟的正反面连续铸铭，可见他并不关心铭文能否全部被阅读，只是尽可能多地将铭文排布于钟面，这体现了钟铭礼仪性的重复和对装饰性的转向。

综上，两周铜器铭文刻写位置及形式的变化，一方面与器形变化、铭文装饰性的转向等有着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亦是与阅读需求相参、协调的结果。从铭文形式上的改变还可以看到阅读方式的转向。春秋时期铭文越来越多地出现线性或布满器表的形式，这意味着观者需不断转换观看角度，铭文的阅读近于“浏览”，发生于移动更为灵活的场景。而西周时期的铭文行款绝大部分呈块状，观者更可能在静止的情况下“凝视”；铭文铸于器内壁，意味着需要近距离地“审读”。这种阅读上的限制，反而为观者营造了一种凝重、专注的氛围。作器者未必有意为之，但在西周的世代延续中，该铸铭形式已有意无意地促成了这种阅读习惯的形成。

两周之间铭文阅读方式的转变应结合其文体特征的变化来理解。纵观两周铜器铭文，大于50字的长篇基本属于书史类^[14]铭文。商周铭文制作的初始目的在于交代作器缘由和背景，随着篇幅扩充，对作器缘由的记述逐渐演变成具有历史书写性质的文本，记载与器主相关的家族大事，涉及王或上级对器主的诰辞与命令、赏赐、册命，以及战功、土地奴隶纠纷及其判决结果等。这些大事在当时肯定载之简册，而将其改写为铭文并铸于铜器上，一方面赋予了这些事件以永久的纪念意义，另一方面也为宗族子弟提供了更庄严的阅读载体。在西周早期，铸铭行为往往更强调其象征与纪念意义，而非供人阅读。因此可以看到像矢令尊（《集

成》6016) 这样的极端例子, 铭文长达 186 字, 铸刻于器底并延伸到前后内壁, 观者无论如何都难以通读全文。西周中期后, 一些书史类铭文以可读性更为显著的方式出现。风仪诚注意到史墙盘、十三年癸壶、迷盘、盞驹尊等铭文的特殊位置^[15]。更重要的是, 这些器物都出自家族铜器窖藏。铜器窖藏往往集中了一个家族数代的铜器, 它们不进入墓葬, 而是为宗族子孙世代保存, 在西周末年东逃时被仓促埋藏。其中一些铜器铸有书史性质特别鲜明的铭文, 堪称宗族重器, 其聚集出现提示这些铭文的阅读有着宗族世代的延续性。正是这些铜器铭文显示出非同一般的展示性。如十三年癸壶在器颈设一圈素面, 将铭文集中铸于前端, 观者在正面观看即可通读全文。又如盞驹尊作骠驹形, 其精美而独特的器形是对铭文内容的呼应, 铭文以扇形的块状形式铸于驹胸前。这些铸铭形式是对西周“凝视”的观看方式的突显。春秋以后, 书史类铭文大幅减少。

两周 30 字以下的短铭则以“器主 + 祈句”类铭文为主, 基本遵循“(作器时间 +) 器主 (+ 作器对象) (+ 作器目的) + 祈句辞”的格式, 体现了铭文最基本的标识和祈句功能。如果说书史类铭文代表着铜器铭文的理想范式, 并最受瞩目, “器主 + 祈句”类则是铭文文体“沉默的大多数”。西周晚期以后, 这类铭文的篇幅变长, 修饰性内容与套语增多, 文辞走向繁缛。春秋以后, 随着书史类铭文的衰落, 这类铭文压倒性地成为主流。伴随着这一趋势的是线性形式铭文的出现。这一形式在西周已可见其端绪, 如梁其壶, 春秋以后逐渐增多。据笔者统计, 春秋以后的青铜鼎, 除去物勒工名类与个别例子(如中山王𤚩鼎), 凡铸铭于器表的都采用线性形式, 且铭文皆为“器主 + 祈句”类。可见, 春秋铜器铭文的文本特征与铸刻形式的总体变化趋势相一致, 装饰性越趋明显, 而可读性及阅读需求则相应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 春秋以后也出现了一些具有浓厚复古色彩的长篇铭文, 它们是西周书史类铭文的回响, 同时又在铸刻形式上有所突破。如庚壶铭文记载了齐国武将庚在三次战争中的功绩及齐公的赏赐, 铭文遍铸于壶颈及肩部外壁。中山王𤚩鼎、壶

的铭文则分别载有中山王的两篇训诫之辞, 以高超的工艺遍刻于铜器素面。这些铭文兼具形式上的装饰性、展示性与内容上的可读性, 实现了文体上的复古与形式上的创新, 也是对阅读需求的回应。

综上, 铜器铭文铸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观者的阅读习惯。西周时, 对书史类铭文的观看是凝视式的审读。春秋后, 铭文观看方式趋向“浏览”而非细阅, 而铭文铸刻更重装饰性而非可读性。书史类铭文衰落, “器主 + 祈句”类铭文占据压倒性优势, 削弱了对铭文的阅读需求。而个别复古作品则实现了文本可读性与形式展示性的统一。

二 铭文阅读的礼仪背景

铜器或作为礼器投入实际使用, 或作为专门陈列的重器供人观览, 对铭文的阅读也在相应的场景下展开。本节通过对礼书文献及铭文的物质性特征的分析, 了解周代铜器铭文在何种礼仪背景下被阅读, 从而探究阅读行为的性质。

在两周时期, 各种重要的祭祀、政治等典礼都在祖庙进行, 祖庙是铜器铭文特定的阅读空间。《周礼·春官·典庸器》云:“掌藏乐器、庸器。及祭祀, 帅其属而设筭虞, 陈庸器。飨食、宾射亦如之。”^[16]《周礼·春官·天府》又云:“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凡国之玉镇、大宝器藏焉。若有大祭、大丧, 则出而陈之。”^[17]所谓“宝器”应包括宗庙彝器。《墨子·明鬼下》云“祭器祭服毕藏于府”^[18], 正与天府收藏重器的功能呼应。

可见, 祭祀重器在平时收藏于宗庙府库, 在特定的典礼下, 被陈设、使用和观看。根据彝器的不同功能, 它们在仪式中被置于宗庙的不同空间, 以下两周贵族祭祖礼为例加以分析。

根据《仪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19], 结合《诗经》《周礼》等文献的记载^[20], 在周代大夫、士祭祖礼中, 鼎在祭礼的前一天陈放在庙门之外, 其上覆盖茅草, 正祭之日盛放煮好的牲肉, 在阴厌环节由庙门外举至庭, 鼎中牲肉升载于俎, 然后撤回庙门外; 洗及尸盥洗用的盘、匱置于庭中; 敦(即簋^[21])盛黍稷, 据《特牲》, 阴厌环节置于室, 佐食将敦盖打开, 却置(即朝上

放置)于敦的南边。在尸入九饭的仪节中,佐食将两敦移到席上,以便尸取敦中的黍稷。两壶分别盛酒、玄酒,覆盖以冪(即覆盖器物的布巾),置于室门东边,供三献等仪节酌酒所用。据《少牢》,举鼎时、尸即位以前,司宫即打开酒尊的盖、冪^[22],置于榭禁上;壶各二尊分别置于庭中阼阶东、西阶西,供酬宾、旅酬、无算爵等仪节所用;另外两壶置于房中,供主妇、宗妇、内宾旅酬用。

在上述内容的基础上细究之,可再从以下几方面认识祭祖礼中彝器的使用及其铭文的阅读方式:

第一,用鼎数量及鼎实制度是主人身份等级的象征,这使鼎在两周人的观念中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鼎陈设在庭中,置于恢弘开阔、参与人数众多的礼仪空间中,举鼎入庭的仪节颇具宗主自我称扬的意味。然而,鼎铭在具体使用场景中却没有太多被阅读的机会。鼎在庙门外陈列时,加“罍”(用于盖鼎的茅草)以覆盖之。在祖庙之庭亦未长时间陈放,且鼎内盛有牲肉,铭文难以阅读。

第二,簋设于室中,用于尸饭和俊食等仪节,阅读空间相对狭窄,阅读者也限于较小范围内。《特牲》《少牢》“阴厌”节、《仪礼·公食大夫礼》《士昏礼》《士丧礼》都有打开簋盖(“启会”)并却置的仪节,因此簋盖内的铭文可以被清晰阅读。

第三,壶置于堂上、庭中、房中,在三献、酬宾、旅酬、无算爵等多个仪节被使用,观者涉及众多宗族子弟及有司。因此,壶在典礼中有大量被观看的机会。在多个东周画像铜匜所呈现的宴乐、射猎仪式中,壶总是处于整个画面的中心^[23],这反映了时人在仪式中的视觉聚焦点。由于壶在礼仪活动中所处的聚焦位置,以及与观者产生连接之频繁,其铭文的铸刻方式在两周青铜礼器中发生了最为活跃的变化。据表1、2对比可知,在铸刻方式上,鼎铭变化较为滞后,而青铜壶在西周中期便出现了在器表铸铭的现象。而且,尽管铜器铸铭方式与器形有密切关系,春秋以后一些具有传统风格的铜壶突破惯例,铸刻铭于器表。如曾伯陔壶(《集成》9712,春秋早期)的风格属周式系统^[24],除了壶内壁铸铭,壶盖及盖口外沿各有一圈铭文,可连读,这种形式是梁其壶的延续;复封壶(《铭图》12447、12448,春秋早期)器形和花纹也接近传统

风格,而铸铭形式则与十三年癸壶相似。

第四,礼器的形制、花纹、铭文与组合关系作为一个整体与礼仪语境相融合,因此在礼学文献中往往能看到这样的表达:“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大庙,牲用白牡,尊用牺、象、山鬯,郁尊用黄目,灌用玉瓚大圭,荐用玉豆、雕篚,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蕨。”^[25]《礼记·仲尼燕居》云“量鼎得其象”是礼的表现,所谓“象”,即器物的形制、大小、花纹、组合方式等,它们共同体现了其背后的礼意,即礼有等差。《左传·桓公二年》臧哀伯指出典礼中器物的陈设可“临照百官”^[26],起到不言自明的鉴戒作用。在典礼之中,对彝器的观看及铭文的阅读,是与仪式所营造的整体氛围浑然一体的。《荀子·哀公》云:“孔子曰:‘君入庙门而右,登自阼阶,仰视榱栋,俛见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则哀将焉而不至矣!’”^[27]与礼者在仪式中观器,引发怀念先祖的哀思,这是一种整体的、沉浸式的感受,而铭文只是密切融入这个场景的一个组成部分,刻意、主动阅读的行为并不明显。

柯马丁指出“观众”在仪式中无需审视铭文并理解它的具体含义,铜器的物质存在已经在有限的精英阶层的“公共”范围内构成“知识”^[28]。这一论断相当敏锐,但是是从祭祀仪式的特定背景出发而言的。宗族子弟可能早已对宗族重器的铭文内容了如指掌,这些知识应是在祭祀仪式以外的场景中获得的。如史颉簋(《集成》4030、4031,西周早期)铭文记载王诰毕公,颉表示将对此朝夕自我鉴戒。自我鉴戒的内容自然是王的诰辞,然而诰辞并没有记载于簋铭,但一定记载于简册,有可能即《尚书序》所载《毕命》^[29]。当观者看到该器,自然而然就会联想到王的诰辞。

因此,“观铭”的意义,所谓“既美其所称,又美其所为”,即除了铭文内容,观者对作铭行为的意义也着意褒扬。《左传·襄公十九年》臧武仲谈论是否应用齐国兵器作林钟,其关注焦点正是作器铭功的行为在礼义上的合理性,而非铭辞的具体内容。在器物被铸造出来并施以铭文的时刻开始,它的意义已被凝固。在此之后,在仪式中被使用,被与礼者铭记,铸铭行为被口耳相传甚至载之史

册，其意义也得以延续。正如《国语·晋语七》记载晋悼公提及魏颢，云“其勳铭于景钟”^[30]，铭文已铭刻于人们的记忆中，而不需征之实物。正因为如此，铜器铭文呈现重复性的特点，一方面，同一篇铭文被重复铸于同一套礼器中，另一方面，铭文出现大量套语，作器者追求的并不是文本的独特性，而是在源源不断地对传统话语模式的延续中实现并强化“美其所称”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铜器作为礼器被投入实际使用时，观器者的沉浸式感受。在铜器被投用的典礼之外，还应存在对铭文主动观看和审读的场景。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宗庙重器会被专门陈设。李峰指出社会活动构成了铭文欣赏的重要背景之一，铜器在合适的场合会被展示给亲朋好友及同僚观摩^[31]。

西周以来便有在重要典礼中陈器的传统，《尚书·顾命》记载新王册命典礼陈列玉器珍宝，以彰显仪式之重。上文引《周礼·春官》记述天府掌藏玉镇与大宝器，每有大事出而陈之，可与《顾命》相印证。这是天子之礼，可推及诸侯卿大夫士。

在典礼之外，祖庙也是卿士大夫、宗族子弟的活动场所，如《荀子·宥坐》记述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时对“欹器”的探究，以及子贡观于鲁庙北堂之事。《论语·八佾》记载孔子“入太庙，每事问”^[32]，这些都可能是器物陈设和铭文阅读的场景。另外，《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云：“庭有陈鼎，家有三归。”^[33]此则为日常陈鼎于庭中之证。

征之铜器铭文布局，可发现其用于专门陈列的证据。如儻匜（《集成》10285，西周晚期）器盖连铭。秦公簋（《集成》4315，春秋时期）器内壁与盖内铭文接续而读。据学者考证，五年琏生簋（《集成》4292）与六年琏生簋（《集成》4293）器内壁的铭文应连读^[34]。这些彝器都是器盖连铭或异器连铭，可推知都是在没有盛放内容物且打开器盖的情况下被阅读的。值得注意的是，琏生二簋与儻匜的铭文都记录了诉讼纠纷及其处理结果，具有明显的公共性，在一些礼仪场合中用作陈列器相当合理。

一些器铭的布局更反映出在陈列过程中，观者主动地阅读铭文。中山王罍鼎铭刻于器表，且从鼎盖延伸至鼎身，只有鼎盖从恰当的位置合上才可以连读。莫阳认为其应摆放在高台或高足案上^[35]。

而且鼎、壶铭文皆遍布器身，说明阅读者只有不断地移动并绕器一周方可通读，而非静止地观看。值得注意的是，中山王罍墓还出土了大量的壶，其铭文都是物勒工名之类，对比之下可知中山王罍鼎、壶上的刻铭的确以陈列、展示为目的。

综上，一部分有铭铜器的陈列功能显示，在某些情景下，铭文的阅读具有明确的主动性，与仪式中的沉浸式感受形成对比。对铜器的陈列、对铭文的主动阅读，意味着它们不仅是与神灵沟通的纽带和具有象征意义的纪念物，而是具有历史文献意义以及昭示、训诫的功能，由此，也就与祭祀、颂祖、祈勺等仪式性功能有所疏离，铭文制作的出发点亦从祖先神灵世界逐渐转移到现实的人的世界。

三 从镂于盘盂到书于竹帛： 载体与观念之变

春秋以后，铜器铭文的阅读主体从宗族内部扩展到更为广阔的范围，对铭文的谈论也跨越了宗族和国别的界限。

柯马丁指出西周铭文的目标读者“不是现在或将来某些无名公众，而是少部分直接或间接参与周王室氏族意识形态中的局内人”^[36]。而铸刑鼎事件的出现，标志着铭文阅读主体和阅读空间的扩大。《左传》有两处相关记载，一是昭公六年郑人铸刑书，二是昭公二十九年晋国铸刑鼎。孔子所说“民在鼎”，据杨伯峻，“在”读为“察”^[37]，这意味着鼎铭的阅读主体从宗族内部的大人君子扩展到万民^[38]；其观看场所也突破了祖庙，被置于一个更为广大的公共空间。藉由铸鼎这一行为，刑法被公布、供万民阅读，并被赋予法律的效力。子禾子釜（《集成》10374）铸有齐国田氏量制的法令，便是此类铭文的延续。

在春秋战国时期，器物铭文逐渐见引于文献，可见人们越来越多地在讲习、议论中谈论铭文，阅读简册上记载的铭文文本，相比直接在铜器实物上阅读，显示出时风的新变。随着“书史”类铭文的衰落，以及“器主+祈勺”类和继之而兴的物勒工名类铭文大行其道，铭文在实物形态逐渐演变为装饰性形式的同时，开始作为一种抽象的文体进入人

们的言谈与文献之中。时人引述这些铭文，其目的并非关注其背后的历史真实，而是以这些嘉言善语作为可资阐发观点的引子。如《左传·昭公三年》记载叔向引用谗鼎之铭以论说^[39]。对于时人来说，铭文与《诗》《书》、先王之教等经典语句的性质是一样的，皆可资言志^[40]。如《礼记·大学》称引《汤之盘铭》时与《诗》《书》同列^[41]，作为论述的证据，可见《汤之盘铭》是人们日常研习的文本，被视同经典文献。春秋战国以后，时人引以说理的铭文文本多具有箴戒性质，而且往往被假托为前代帝王或圣贤的作品。根据出土实物，商代铭文只记载作器者或祖先之名，篇幅较长者或记其作器缘由，《汤之盘铭》与之迥异，因此应为构拟之文，而非铜器的转录^[42]。又如《国语·晋语一》记载郭偃称引“商铭”^[43]，其中“之”“也”等词的用法见于春秋以后，可知其非商代文本。

又如《左传·昭公七年》孟僖子所引正考父鼎铭^[44]，是正考父接受册命后的自警之辞，“饴于是，鬻于是，以餬余口”之语与鼎的食器功能形成呼应。春秋后箴戒类铭文往往从器物用途出发，将器主的日常使用经验融入箴戒之辞。这篇铭文与西周册命铭文在立意、体例和风格上都完全不同。册命铭文一般记载王的任命与赏赐，其目的是称扬王的赏赐并自我夸耀。而正考父鼎铭则将重点放在三次赐命后自身态度的变化上，“饴于是，鬻于是，以餬余口”的表述将用鼎的行为完全个人化，鼎用享祖考的功能被转化为个人粥食糊口的日常用途。在两周彝器制作的大传统背景下考量，这样的铭文并不符合惯例，属构拟之辞的可能性更大。《庄子·列御寇》所引正考父鼎铭与《左传》所载文本相关，但有一定差异^[45]，将正考父与凡夫的态度加以对比，形成先后呼应、对称的文本。鼎铭的文体特性已完全消失，成为言说中可资利用的文本资源。

先秦时期被广为诵习和引用的格言式“语”类文献，即可能被依托为铭体，以达到说理的目的。李零指出春秋战国某些所谓的“铭”属于“语”的范畴^[46]。这是由于两者都具有语句精炼、立意隽永的文本特色，有一定相似性。《大戴礼记·武王践阼》记载武王所作多种器物之铭，其构拟性质颇为明显。有证据显示其中所录的铭体文本是由不同

材料抄撰拼合而成的，比如某些铭文并未特别切合该器物的特性，如席后右端之铭、户铭等。恰好在《上博简（七）·武王践阼》中，与传世本户铭对应的文本被称为“卣（牖）铭”（简10）^[47]，而传世本的牖铭又另有其文，可证其抄撰无定的性质。这些材料中有不少“语”类文献，如传世本“盥盘之铭”有“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溺于渊犹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之语^[48]，而中山王罍鼎铭云：“乌乎，语不悖哉，寡人闻之：‘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两处文本同源，而鼎铭引述时称为“语”。再者，《孔子家语·观周》《说苑·敬慎》载“金人铭”，部分文本与《武王践阼》的席铭、楹铭有同源关系^[49]，应是撰者将这些“语”类文献撰钞在一处，并将之托为先王之铭。贾谊谓：“语曰：‘爇爇弗灭，炎炎奈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50]亦与《金人铭》同源，贾谊明确将其称为“语”。这表明在战国时期，一方面，这些语类文献已经广泛流行，另一方面，新的铭体观念形成，于是出现了移用材料以托为铭体的现象。

另外，《汉书·艺文志》记载箴戒类铭体文两组。其中道家有《黄帝铭》六篇，即蔡邕《铭论》云“黄帝有巾几之法”^[51]；另《汉志》杂家有孔甲《盘盂》二十六篇^[52]，蔡邕《铭论》云：“孔甲有盘盂之诫。”^[53]《文选》注：“《七略》曰《盘盂书》者，其传言孔甲为之……书盘盂中为诫法，或于鼎，名曰铭。”^[54]由此可推断这些也是箴戒类铭文。它们当然不是黄帝时的真实作品，但从中可以看出东周至秦汉时人对铭体的阅读和利用方式的转变：第一，是将格言类语类文献加工、假托为铭体文；第二，是将这些铭体文本集中抄撰在一处，以简册形态阅读、传播。

出土材料中箴戒类的器铭并不多见^[55]，而文献中的箴戒铭辞却甚多，这当然要考虑到考古材料有限的原因，但同时也说明铭体开始从物质性、实用性的礼仪文体转向文献性、观念性的书面文体，实际上这也是周秦以来文体及文体观念发展的总体趋势。战国时，铭体观念已经明晰。中山王罍鼎铭开头云“于铭曰”，这是对文体的自我指称和自我确认，意味着铭文不再是彝器上的附属信息，而是成为作器的初始意图。同时，铭文的箴戒功能也在铜

器上得到强调。中山王𦉑壶铭末云“明蔡之于壶而时观焉”，可见铭文的阅读情景不限于祭祀等典仪式，而是供人日常观看，以自我警戒。“昭告后嗣”“以戒嗣王”透露出明确的箴戒性质。“载之简策”提示战国时将铭文载录于简策的风尚，这与东周人在言谈和著述中喜引用铭文的现象是密切呼应的。

由此，一方面，铭作为一种已被反复、充分运用的文体，超越了在铜器铸造的流程中被自觉运用的文体形式，成为一种文体意义被高度概括的概念。在《礼记·祭统》“铭论”中，便可以看到对铭体功能的详细描述和抽象概括。另一方面，铭体开始脱离自身的实物载体及其依存的礼仪制度，成为可以根据讨论切磋的需要而撰写的文本、可以被引用以阐发己见的思想碎片。它作为一种可以被构拟的文体，进入了文献，成为观念和思想的遗存。铭文不再是礼仪中几乎可以超越语言的沉浸式感受的对象，而更多地成为竹简上随物赋形的语言片段，为精英阶层所共享。

这就是两周铭文的阅读方式与观念之变，秦汉以后，随着文献整理和著述的活跃，这种转向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由于逐渐脱离了实物载体和实际的礼仪用途，铭体概念在被高度概括的同时也出现了混淆。蔡邕《铭论》并举黄帝巾几之法、孔甲盘盂之戒、武王杂铭、金人铭、钟鼎之铭，甚至太常之铭等，实际上是将几种不同的文体混为一谈，对实用的宗庙重器之铭与构拟的文献之铭亦不作区分，其背后的直接原因是东汉已经没有周代那种承载着浓重的祖先信仰和紧密的宗族联结的彝铭，代之而兴的是箴戒之铭与碑铭；其根本原因是在“以体命篇”观念^[56]的影响下，时人直接将以“铭”命名的文本都归入同一类文体，而未辨明其背后真正的名实关系。这一文体观念直到《文心雕龙》，甚至明代《文章辨体》《文体明辨》等仍可以见其余波，是影响中国文体分类的重要因素之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出土文献与先秦文体学新证”(项目编号17BZW196)的阶段研究成果]

注疏》，阮元校刻，第1606页，第802页，第776页，第1489页，第1743页，第2467页，第2031页，第1673页，第2051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2] 巫鸿：《“空间”的美术史》，钱文逸译，第93—94页、第9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3][35] 莫阳已做了启发性的尝试，参见莫阳《战国中山国中山三器的再观察》，《中国美术研究》2017年第4期。

[4] 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第158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5] 参见石璋如《商周彝器铭文部位例略》，《大陆杂志》第8卷1954年第5—7期；风仪诚《商周青铜器铭文位置演变初探》，《人文论丛（2009年卷）》，冯天瑜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黄庭颀《春秋青铜礼器铭文演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文学院，2016年。

[6]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吴镇烽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以下简称“《铭图》”。

[7]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吴镇烽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以下简称“《铭续》”。

[8] 王世民：《西周暨春秋战国时代编钟铭文的排列形式》，《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二集）》，第106—120页，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陈双新：《两周青铜乐器铭辞研究》，第78—99页，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1984年版。以下简称“《集成》”。

[10] 王世民：《西周暨春秋战国时代编钟铭文的排列形式》，第108—115页。

[11] 陈双新：《两周青铜乐器铭辞研究》，第81—82页。

[12] 参见赵世纲《浙川楚墓王孙诰钟的分析》，《江汉考古》1986年第3期。

[13]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浙川下寺春秋楚墓》，第140—174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14] “书史”类铭文的观念由郭沫若提出，即为书约剂、记功而铸器之类，参见郭沫若《周代彝铭进化观》，《青铜时代》，第380页，群益出版社1946年版。

[15] 风仪诚：《商周青铜器铭文位置演变初探》，第122页。

[18] 《墨子间诂》，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第235页，中华书局2017年版。

[19] 以下简称“《特牲》”“《少牢》”。对《仪礼》经文的理解参见《十三经注疏·仪礼注疏》；胡培翠：《仪礼正义》，

[1][16][17][25][26][32][39][41][44]《十三经

段熙仲点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仪礼译注》,杨天宇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刘源:《商周祭祖礼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因篇幅所限,不一一出注。

[20] 学者一般认为《仪礼》反映的是西周礼制。然而若与考古成果对比可知《仪礼》中依然有一些东周的内容,若要细究,很难在时代上作截然的区分。因此,在铜器的使用方面,两周制度应有一定的延续性。本文所利用的三礼、诸子等材料在年代上或有先后,暂且作模糊化处理。

[21] 《仪礼》中簋、敦不分,参见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第25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2] 关于壶盖与冪的关系,根据《特牲》“记”,前言“盖在南”,后面又说“冪用冪”(《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第1192页),可知应为二物。

[23] 如山西长治市分水岭12号墓鎏金铜匜(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长治市分水岭古墓的清理》,《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长沙楚墓出土铜匜(54长黄墓5)(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楚墓》,《考古学报》1959年1期)等等。

[24] 关于两周铜壶的器形与风格变化,参见高崇文《两周时期铜壶的形态学研究》,《古礼足征:礼制文化的考古学研究》,第307—35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27] 《荀子集解》,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641页,中华书局2013年版。

[28] Martin Kern, “The Performance of Writing in Western Zhou China”, S. La Porta & David Shulman (eds.), *The Poetics of Grammar and the Metaphysics of Sound and Sign*, Leiden: Brill, 2007, pp.113-114.

[29] 参见唐兰《史馥簋铭考释》,《考古》1972年第5期。

[30][43] 《国语集解》,徐元浩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第406页,第252页,中华书局2002年版。

[31] 李峰:《西周的读写文化及其社会背景》,《青铜器和金文书体研究》,第12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

[33] 《韩非子校注》,《韩非子》校注组编写,周勋初修订,第350页,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

[34] 陈梦家认为两器铭文应连读(《西周铜器断代》,第232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另参见林沄《珣生三器新释》,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 <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84>, 2008年1月1日。

[36] 柯马丁:《从青铜器铭文、〈诗经〉及〈尚书〉看西周祖先祭祀的演变》,陈彦辉、赵雨柔译,《国际汉学》2019

第1期。

[37] 《春秋左传注》,杨伯峻编注,第1504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

[38] 王沛:《刑鼎、宗族法令与成文法公布——以两周铭文为基础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40] 参见韩高年《春秋时期的铭论与铭体》,《文学遗产》2009年第6期。

[42] 郭沫若指出盘铭原文当为“兄日辛、祖日辛、父日辛”的误读(参见郭沫若《汤盘孔鼎之扬榷》,《燕京学报》1931年第9期。董作宾已证其说不确(参见董作宾《汤盘与商三戈》,《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1950年第1期)。

[45] 《庄子集释》,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第1060页,中华书局2016年版。

[46] 李零:《我们的中国(第四编):思想地图》,第10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

[47]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马承源主编,第160—1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48] 《大戴礼记补注》,孔广森撰,王丰先点校,第116页,中华书局2013年版。

[49] 参见刘向《说苑校证·敬慎》,向宗鲁校证,第258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朱渊清《〈金人铭〉研究——兼及〈孔子家语〉编定诸问题》,《知识的考古——朱渊清自选集》,第287—30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50] 贾谊:《新书校注》,阎振益、钟夏校注,第74页,中华书局2000年版。

[51][53]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74,严可均辑,第875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

[52] 班固:《汉书》,颜师古注,第1740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54] 《文选》卷五六《新刻漏铭》“盘孟小器”句注,萧统编,李善注,第777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55] 如战国鸟书箴铭带钩(参见李零《战国鸟书箴铭带钩考释》,《古文字研究》(第八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鱼鼎匕(《集成》980)。

[56] 参见吴承学、李冠兰《命篇与命体——兼论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的发生》,《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赵培